解放前荥经烟祸略忆

陈耀伦

西康在反动统治时期，少数民族是刀耕火种，生产落后。就是汉族地区，也是山多田少，地瘠民贫。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普遍种烟，不几年间变为烟区、匪区，集市变为烟市、枪市。火药臭，硝烟起，打明仗，报私仇，打冤家，泄私忿，始而军民交利，继而军民交恶，后来演成所谓雅属事变，伪保安队全军覆没。其原因在于年年种烟，年年禁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年年因禁烟而杀人，年年因种烟而获利。拿种烟来说，由山区种到平坝；拿禁烟来说，由“锄头队铲”到“竿竿队打”；拿收烟来说，从烟金到亩捐，从亩捐到窝捐；拿售烟来说，从生泥加工到吗啡、白面、梭梭、批子、红丸、快中快、手里酥，还有烟馆里的清水烟，揭烟皮、漂烟、翻烟、拌烟、二道烟……分行别类，不一而足的来供应瘾士们的吞云吐雾，数年之间，百分之八十的青年男女，堕入烟云世界，除了烧烟，才说吃饭。

当时有人沉痛地描述瘾哥们的生活：“终日无事只烧烟，坐也安然，睡也安然。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这样的腐化生活，把人变成鬼，把人世界变成鬼世界，现在回想起来，犹觉毛骨悚然。这里仅就当时荥经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鸦片的一些点滴作一记录。

一、荥经种烟经过

西康在清末民初烟禁最严厉的时候，由于地处偏僻，一直没有禁绝，如宁属的两盐（盐源、盐边）和凉山地区，雅属的穆坪（即今之宝兴），都是产烟内售的地方。不过当时是在深山箐林小片土地上偷种一点，至多也不过三五十亩。在民国五年以后，四川烟禁一开，宁、雅两属才普遍大种起来。嗣后又复禁种，又回复到边区深山箐种，偷种小片土地的情况。到了抗日军兴，烟税开征，种烟又合法化了，但荥经仍未种烟。当时荥经不但农民不愿种烟，就是地主士劣所谓士绅也者，也不热心种烟。第一是农民缺乏籽种，又怕烟毒影响后代，因而甘愿种粮食而不种烟。第二是地主因为种烟是小春，不能收租，无利可图。至于所谓一般士绅，或者由于认识鸦片流毒，或者自己没有沾染，也就无意提倡。后来荥经来了一个县长唐登汉，他是大邑县安仁镇的刘五老师的介绍，刘五老师即是刘文彩，是四川的典型恶霸地主，是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亲五哥。他一上任就发动各乡镇种烟，并由刘文彩在云南、西昌引来烟种，由唐登汉的私人管事分售与各乡镇长转发给农民。地方人士知道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猜想到这是刘文辉有意要种，他是有所持而不恐的，唐登汉敢于公然种烟也只是秉承刘氏弟兄的意旨。因此有人说："唐登汉为刘文辉治病，带几句话都可以治好。"这句话是说明他们间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就西康全省来说，当时可以说已是无县不种烟，如刘文彩和唐登汉那种

人，更不知道有好多。如象在宁属有李万华、杜履谦、唐福珠、伍培英、张植初、唐济谋等；在雅属有王靖宇、刘元琮、陈光藻、刘金安（刘文辉的卫士长）李林、刘济民（刘文辉的卫士）等；在康属有唐永晖、胡子云、邹善成、李先春、王玉岗、李月廷（刘文辉的卫士）等。大利所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种运售吸，五花八门，各有一套。公中有私，私中有私，专人负责，防区俨然，个中内幕，固非外人所得而知也。就荥经一县来说，也就可以推知其余了。荥经种了一年鸦片之后，发现货色质量很高，超过了天、芦、宝和宁、康两属各县，其冲头香味仅次于云南“夷方货”，与云南的丽江货并驾齐驱，在各方的市场上与云南土一般媲美争雄。自然在这一年里，各阶层都直接间接有点利益，尤其是政府军队首脑和土劣流痞获利更为丰富。从此荥经就历年都种，历年都收。但是伪中央当时有禁烟文告和派来查禁的大员，如西南禁烟督察长、禁烟执法监等类的专职人员来往查禁，看来好象是要雷厉风行。因此刘文辉的对策，一面要应付伪中央，一面又要收获烟税的利益，他的办法就是又种，又禁，又铲，又收。而下面的一般贪官污吏，乡镇保甲，劣绅土豪，官佐士兵，地痞流氓，自然就都从中沾光渔利，形成社会的畸形发展。

二、借禁为名的收购勾当

每当秋季，大春收获以后，就是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的：“鸦片流毒，为害民生……”的韵文告示，由县府转交乡镇张贴。但是凡贴有告示的地方，就是大小烟馆的门口，

一般旅行者或当地的瘾哥们就以贴告示的地方为烟馆的标志，已成为习惯的暗号了。此后络绎不断的伪中央禁烟官员，有西南禁烟督察长，有禁烟执法监等大员以及伪西康省政府派的禁烟专职官员，往来不绝，民间赠给他们一副对联，是“冠盖往还，每过烟区都驻马；云烟吞吐，纵然茅屋也停车”来形容他们借禁为名，通过查禁工作来打下收购现烟的基础。每个官员都随带有私人管家，四处活动。国民政府来的大员管事总是以孔部长、赵司长……的太太或千金小姐、少爷公子的脂粉费、糖果费等为借口。省里来的官员，总有安仁镇刘五老师公馆里的管事同行，来代刘公馆购订预货；还有依草附木的人，攀龙附凤的客，也要在这个时间沾一点光，分润一点预货的收购。他们联系农村的权威人士，交往乡镇的保甲人员，其手段是不一而足：有送情赶礼的；有先交款子的；有与农民垫一点肥料本钱的；也有交钱与农民订立条约的；其他更有只负名义（某权威托裁的烟）到收烟分干二成的；还有到处送小礼认亲戚，拉关系来希图烧点冷灶，将来分润沾光的。至于乡镇保长，在这时自然有种户向他们表示：某乡长，我与你点了几亩地；某保长我与你点了几分地；等等。他们只是照名登记数目，将来按名收烟。在驻防军队方面，起初是把部队上的坏枪交给乡下掉换现烟，后来发展到买些坏枪去换队伍上的好枪，又把好枪来掉烟。刘元琮师长就是这样，把周俊武连长那连的意大利枪用川造新式枪换下来，交到荥经去掉东区的干棉货。后来部队之间，用坏枪掉好枪，就相习成风了。大官公开掉换，小官偷偷掉换，兵士也学会把身上挂的好子弹用空包或者废弹换下来去掉烟。乡里的枪弹多了，对枪弹的质量一天一天的也

就选择起来了，军队的好枪好弹，逐渐转移了阵地，乡里的武力一天天地扩大，播种的面积，也就一天天增多。依据数年的经验证明，禁烟的文告愈多，播种的面积愈大；禁烟的官员越多，销烟的市场越广；培养了多少恶霸横行，造成了满眼的哀鸿遍野。

三、查铲队的形形色色

每年当烟花遍开，乌红素白，风景宜人的时候，省方必定派遣大员赴县查铲烟苗，那就是民间歌谣所说的“师长出朝，地动山摇，烟光当道，鬼哭神嚎”的景况了。这段期间各乡镇就准备酒鸡鱼、海味山珍来迎风接驾，师长选择的查铲重点，也是好吃好玩的乡村。如石滓乡、顺江乡等地，那里有的是鲜鱼海味，野味山珍；有猎犬引猎玩山；有钩竿渔船玩水；有麻将棋牌等供大小官员的消遣岁月，师长就在这些地方住下，尽情享乐。玩了一段时间，到拔队返雅安的时候，就派锄头大队下田铲烟，并且一定要杀二三人做榜样，以便销差。刘元琮师长在天全查铲时，到了十八道水，那里种烟之户，都是和军方或政方有关的，例如保安处长王靖宇在那里的田最多，其他都有背景，在种烟户中，找不出可以杀来做榜样的，就下令清查油枯，据他说油枯是种烟的肥料，家里有油枯，就是蓄意种烟的表现。但是清查的结果，存在油枯的农民很多，这些农民一般正是没有背景的人，结果他用抽签法的方式来杀了两人，并宣布罪状说是拒抗铲烟。截山脚高朝铭也是没有背景的农民，家里贮酥麻数斗，刘元琮就诬为烟籽种，竟将高朝铭枪毙示他铲烟的成绩。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荼经铲烟时，还异想天开，组织竿竿队，每逢交涉没有办妥的烟户，他就用竿竿队到田里去掸落烟花，鸦片是有限花序，每根茎端只开一花，花中结实，花落果出，称为烟桃。竿竿队每逢交涉没有办妥的烟户，就到田里去掸落烟花。如果交涉办妥的种户，就派锄头队去连根铲起，倒伏地中，在查铲队开走之后，种户又把它扶正补栽，不久之间又可恢复原状。当时有民谣说："风调雨顺烟价贵，鸡不叫来犬不吠，不把包袱送对头，谨防遇着竿竿队。"

四、"繁荣忙碌"和呻吟痛苦

唐县长在每年烟会的前期，就要把乡镇长加委一番，因为收烟时节乡保长的油水很大，必须与县长献上一笔大款，才可以得到加委状。如果包袱小了，加委状就送到钱多的人的手上去了。顺江乡乡长熊大璋，因只送了金圈十二支，就没有得到加委状，后来向亲朋借贷款凑足二十支金圈，加委状才得到手中。其他每个乡镇长都不两样，不过礼物不同，方式各异罢了。烟会期临的加委状，异常宝贵。缮写委状的，封印委状的，转发委状的，登记委状，还有先去报喜的，衙门里上上下下太太小姐丫头老妈以及打杂勤厨人等都是要吃喜分红的。这笔收入的款项，也就是衙门上下人等预备购买新烟的准备金了。当然乡长回乡，又对于保甲长也是照这套方法来索取现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算是当时的常规。

收烟金的队伍到了乡间，一面由乡长保长分别评产；一面由商贾们筹备烟会。临期景象是说不完的风花雪月，玩不

尽的烟巷花街。收烟忙，缴烟忙，做膏子渗假更忙。四面八方的劣绅土豪，三山五岳的流氓恶霸，袍哥痞子，妓女玩童，彩客赌棍，方士相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来自重庆、南京帮部长太太们收货的，也有来自省城帮少爷小姐们买烟的，送人情，收礼物，买东西，掉枪弹，忙碌繁荣，俨似商埠。一般是必定要在所有收货、买货手续交收完毕，才开始收税。种户运来上税的烟土，总是被乡镇保甲权威人士，估收估买。县长乡长要买，营长连长要买，客商要买，班长兵士也要买一点。种户的收货已经卖来差不多了，才开始称收烟税。如果种户的现货已经卖完，欠下来的自然是归入正税了。这时名正言顺，或吊或打，或者用其他为人类所没有看见的烙刑来索取，美其名是催收正税。还说百分之五的税并不苛刻，干竹竿要烧才有油。石滓乡聂庚三乡长的乡公所，钉了一尺多长的粗钉子十余根，是用来吊那些欠缴烟税的。荥河乡欠缴烟税的胡鸣高的牙齿，是被彭乡长的狗腿子用钉锤敲落的。这样不数年间，乡长们在城里买了大院子的新屋，镇长们在村里修了很宽阔的别墅，至于攀龙附凤的跑腿们，也是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吃不完的海味山珍，天天都是宴会，常常都在迎宾。

种烟换来许许多多枪弹，全部落在地主豪绅之手，用以镇压人民，一面也成为他们内部互相残杀的武器。截山脚高朝铭家本来与池里头王鹤舫家是老亲旧眷，常有往还。那年王家送了高家三斗酥麻，后来被刘元琮诬为烟籽，将高朝名镇压示众，高有内弟二人，是当地有一无二的好事流氓，高妻向其哭诉原因，他们竟误会为王家有意陷害，遂约了几个小伙子到王家去不由分说，打死王家男女五人，但恰恰错脱了

王鹤舫的三个儿子。这三弟兄就约了十多个青年，把高家的全家和曾经帮助高家打王家的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共打死二十多个。这件事错综复杂，前后一共死了三十余人。新添乡乡长孙雨膏的儿子孙得舟，是县里数一数二打死人不尝命的恶少，在烟溪沟陈志霄的别墅附近试枪，子弹正飞过陈家的屋顶，陈志霄的儿子陈清源认为藐视了他，彼此口角一场后，相互调来队伍，战斗了半月之久，双方打死了十多人。后来花滩乡的乡长田豹卿因与孙雨膏是郎舅亲戚，也调花滩乡队伍来助战，竟至打到城里，打死了不知多少无辜的居民。后经县长电请陈耀伦和省府秘书长到荥调解，才得平息，但城中被流弹伤亡的老百姓只有呼冤枉了。陈志霄是城关镇的镇长，与驻防军队往还甚密，事后又通过军队驻防营长黄振之手，把田豹卿打死。象这样的事，在城在乡，年年都有。当时有这样的歌谣："烟云世界里，人命贱如虫，乡里老百姓，一步走不通。"足以反映那时烟枪社会是乌烟瘴气到什么景况。

摘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熊纪香与唐登汉

朱世正

荥经烟祸，始于一九四三年唐登汉当县长、熊纪香当乡长时，后来的“荥经事件”演变为“雅属事件”均始于斯。

熊正书号纪香，荥经东区道底坝，熊家下院子人。父亲熊金城，是一个跑滩的中草药医生，人称豆子先生，大哥熊耀山，生一子熊大壁，二哥熊正熙，熊纪香行三，大妇人观音铺陈家女与候少轩联襟，一九四零年娶张桂枝为妾，除下院子半个天井外，一九四五年在雅安新桥地段买了一大院房子，准备洗手不干，当“寓公”。

熊纪香幼年家境贫寒，常跟熊金山出外行医，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混饭吃”，熊金山是个医生，他在熊纪香胸部做了两个棕黄色的假奶，后来熊纪香就自欺欺人说：“文王之胸四奶”，我熊纪香胸上就长了四个奶奶、标榜自己是“文王再世”进行招摇撞骗。

一九四〇年熊纪香已是一个二十多岁大汉子、在道底坝，新添站输打赢要，俗语叫吃得开，抚熊大碧为子，他乘机退出仁羲公，成立礼字社，袍哥组织，借与儿子完婚，邀请礼字袍哥大爷，从邛崃、蒲江、大邑、洪雅、名山、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等县请来数百人，果真宾客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门，坐了三百多桌，热闹非常，显赫一时，熊纪香当上礼字大爷后，依靠他的靠山，干起吃人肉，喝人血的勾当。为了发财，出卖自己同伙和兄弟伙，如郑子英、石开泰、杨纯武等，这些人，都是吃过血酒的“兰交”弟兄被出卖了。

熊纪香与侯少轩、余登云、殷羲廷、贾成之，方吉廷、廖茂修等结为一体，依靠邹善成和他姐夫权势，更是无恶不作，从大渡河到新津渡，都是他们的天下，在雅安城已闹得不成话了。雅安城防司令张伯言，不能不管，下令追捕熊纪香，他得知后，潜逃成都，历经五老师（即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的大管事安玉勤、二管事贾成之从中说项，引熊纪香到安仁镇，拜见五老师，五老师指派熊纪香住“集贤馆”，熊纪香在成都……安仁镇混了半年之久，结识了五老师的私人医生唐登汉。

唐登汉又名湘帆，崇庆县人，常住安仁镇，是五老师赏识人物，五老师大管事安玉勤，二管事贾成之，熊纪香互相勾结，根据贩烟不如种烟论理，向五老师提出建议，在鞭长莫及的雅安地区，种植鸦片烟，是无本万利的好机会，我们采取明禁暗种手段、国民党中央也无可奈何于我。请求五老师建议西康当局委派唐登汉出任荥经县县长。五老师在十二万两大烟的巨大财富下通知了西康当局。请求五老师再函张伯言，张碍于情面，撤销对熊纪香的通缉令。

一九四三年唐登汉就任荥经县县长，他第一手是撤换乡镇长，先撤去顺江乡乡长熊大文，委派熊纪香继任，荥经县的乡镇长撤的撤，换的换，保留的保留、加委的加委、清一色成了唐登汉门徒，指派熊纪香总揽荥经烟务，全县烟金，公烟集中缴在顺江乡。

第二手唐登汉，熊纪香派专人去云南买烟种，运回道底坝，大肆宣传种烟好处，以十倍高价将烟种卖给农民，无钱购买烟种农民，可在新烟上市时付本息，从此荥经烟禁大开，荥经有识之士，敢怒而不敢言。烟禁一开，从山区到平坝，毁良田沃土种烟，毁山林、茶园种烟，不愿种烟农民，要科以“懒捐”，种下去后在冬腊月要论窝头上窝捐，临近成熟开割前，却派来刘大队长，黄大队长“查铲烟苗，表面是查铲，实质是用武力要挟农民，议定“烟金”“公烟”。在那畸形社会里，大烟成了农民的生命，官吏强迫种的大烟，一旦被铲，土地丢荒，一季小春作物颗粒无收，全家生活就陷入绝境，逼倒硬着头皮接受“烟金”摊派，只一九四三年就要向五老师缴纳大烟十二万两，乡镇保长层层加码、大称称烟，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下，种烟农民负担沉重。还要被迫议价预售给某太太，小姐，公子，奶妈的“新货”。

唐登汉另一手是“卖乡长”，如道底坝的熊大章，为了买顺江乡长，花了八只金圈才买到，要得到委任状，还要交上盖印钱，吃喜钱，送报钱，保留的乡镇长，也要向唐县长送去三、四百两大烟才能保着。买乡长，保乡长也是可以大捞一把大烟利的。

每逢阳春三月，烟花怒放时节，唐县长率自卫中队的全班人马出巡四乡，红红绿绿满原野的烟花，看得人眼花缭乱，唐县长陶醉在腰缠万两，驷马还乡。唐县长在石滓、荥河烟乡，白天上山打猎下河捕鱼，晚上在烟盘上，麻将桌上，讨价还价应缴烟金，公烟多少两，吃的是山珍，河味，玩的是纸醉金迷，卜克麻将，达旦通霄，人民血汗填不满豺

狼们的欲壑。

五老师派来的提烟“专员”安玉勤，贾成之带来一批歪戴帽子斜穿衣打手，横行在荥经县主要乡镇，弄得乌云遮日，民不聊生，当时有民谣云：

种烟禁烟在杀人，万花拥出荥经城，
荥经城中鬼嚎哭，哭告当局与豪门，
倾家荡产卖儿孙，烟金烟税巧豪夺，
年年禁烟年年种，官吏士绅烟满窟，
登汉四乡走一遭，远近一片红红绿，
呈文一纸“烟铲完”，烟金烟税“弥陀佛”。

这的确是荥经烟祸真实写照。

熊纪香由于难满其欲壑，驱逐他的狗腿子对种烟农民，不择手段的捆绑吊打，追缴“烟金”，有的老汉一根根胡子被拔掉，有的老汉牙齿一个一个被敲落，有的手杆被吊脱，有的孕妇被吊出婴儿，弄得荥经四乡，天怒人怨，鬼哭神嚎，这就是唐登汉，熊纪香种下的祸根。

五老师大管事想依靠熊纪香大捞一把捞不到，不能满足其欲望，就向熊纪香提出：“袍哥人家，弟兄间问题不说，五老师原定的货是十二万两要完成，不完成我们对五老师不好交待”。逼得熊纪香十二万多两大烟拿不出来，就开了黄腔说“五老又怎么样，他在安仁镇，我在顺江乡，他把×子给我咬了吗……。”话只两三句，五老师大管事二管事，只好将九十多背大烟运到雅安，挖去心子，填进了面筋膏子，运往安仁镇。五老师发现后，直问安贾二人，怎么搞的为什么有膏子？安、贾二人说：这是熊大爷自己装封的，我们不清楚，装好就运，不仅如此，熊大爷还气愤说：“你在安仁

镇，他在顺江乡，难道他把×子给我咬了不成……”。五老师当场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疲货！你们吃素的，我给他的生，也能制他的死……。安玉勤、贾成之，熊大×密谋打死熊纪香。

熊纪香东藏西躲，乘夜幕降临，从泉水湾经槐子坝，渡过黄板渡船、潜到雅安，依靠旧友人事关系，用一千多两大烟，在雅安新桥附近买了一大院房子。在小北街于馥记餐厅（潇聋子开设）请吃交价酒，在回家途中，突然一声枪响，正从熊纪香腰眼、子弹穿过胸膛，从肩臂而出，他窜到墙脚，送进仁德医院不久，一命呜呼！

熊纪香死后乡人送了两付联云：

（一）

野性难驯，欺人欺己复欺天，毕竟
终归“强力式”。
痴心未了，爱儿爱妻还爱妾，而今
烧了“断头香”。

（二）

棒老二当了多年，孽因孽果咎由自取。
狗王八也有今日，断子断孙天理不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写于羌江河畔

种烟年辰的一些社会异象

石章珣

荥经县种植鸦片烟，据有文字记载始于民国13年(1924)我能回忆的是1935年为躲国民党飞机，被大人拉着，卧在烟苗行里。这是我对种烟的第一印象，也说明从此时起，种烟的历史，也有10余年了。由于红军长征过境，赓即中央军追来，种烟这弱国病民的弊举停息了。1943年唐登汉任县长一上任就发令种烟，直至1950年秋，人民政府下达秋种紧急指示，要求“所有种烟土地应一律改种粮食”。令达风行，上下一心，坚决禁种，种烟乃绝。种烟年辰社会异象颇多，仅就点滴见闻述作史料。

1943年，土地占有者纷纷改变租佃形式。改定额地租为分庄租。秋种前，唐县长要发令种烟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县风闻。有土地出租者，就向佃户提出要减少年租额，改分小春。如原定年租额一亩地为6斗（每斗38市斤）玉米，减为3斗或4斗，小春收割平分。夺佃，增多土地出租者计算雇工种烟更有赚头，就把肥田好地夺回。多少佃耕农户受逼只好佃耕瘦脊和二荒地。加租加压，向佃户增索租烟每亩3至5两（16进位制，下同）。原本经商、从工的人，也到农村设法耕地种烟。总之从省到县的军政官员以

至乡保长无不想“从鸦片烟中增加收入”。佃地种烟的人心里也想一亩地可得20至40两左右，即使自得其半也还划得着。因为当时一两烟价可买1斗（40市斤）米。于是把原来只种一季大春的冬闲地种上了烟。各种人都指望种烟会“增加收入”，故呈现了“四乡无闲田，烟苗遍地生”的景象。

种植鸦片烟的工序比种小麦、油菜多，花工又花肥，大部分工序在霜雪寒天进行。有钱有势的大户，自然全程雇工耕种；中、小户也不愿自己去挨冻吃苦，有能力雇工的就雇工，因此散工、包工就紧俏起来，工价也就提高了。匀苗、薅苗是轻工，原只值半升米，一个工变成一升米，担粪扪苗就是两升米，还得三顿饭吃。乡间农民除料理好自家种植的鸦片外，就可就地帮工挣钱。城镇贫民也愿到乡下帮工挣钱了。到春夏割烟时，工价更高，一个割烟工，主家除了供给烟、酒、肉、饭外，最少还要给二升米或二钱烟的工钱。由于县境气候呈垂直变化，收烟期前后约两月。卖工的就暂时不愁无处卖工了。

有土地出租的有钱有势的人家，都雇用，豢养一批人为其内外奔忙。这批人中除出苦力外，多是乡间或城镇的“滥子”（嗜烟、酒、赌者）之类。出租土地的大户，分庄地多，每分地都要派1、2人去监视。

种烟年辰，贫苦农户出卖“老捱”烟是常有的事。他们为渡年关、春荒，或遇天灾人祸时，只好将未成熟的烟出售，待5月收割后交货。其价一般为市价的一半。有钱有势的人都愿买这种烟，图价便利。收烟之际，也正是赶烟会的时候，各路军政要员、客商云集，或攀亲访友，或拜把结邦。至于城镇就更热闹了。外地川戏班子也来县地及荥河、

花滩、新添站场上驻演。张二哥领班的“明荥剧部”从1940年起就常在荥驻演。张二哥叫张明清，保安6大队长，地方势力都愿攀他，帮他捧场。1943年，钟国安的川戏班子除在县城内演外，还出外去新添站、前聚坝秦底下等地演戏。戏班子到秦底下驻演半月有余，小山村一时沸腾起来，这是空前未有的，各种买卖生意也兴隆起来。那时，我还不懂戏，喜欢偷偷地从戏台侧面钻到后台去看化装、打脸子，有时还窜到后堂，见演员们睡地铺、垫草席，有些铺上摆着烟盘，在昏暗的烟灯下一些休息的演员横卧着烧鸦片。台上打鼓的也乘着间息跑到后堂喊：快给口烟吃，不然就吼（帮腔）不出来了！我把看到的讲给大人们听，他们说这戏班中多数人是来挣“胖子烟”吃的。所谓“胖子烟”，就是裹的烟炮子象花生米一样胖大。

赶烟会，使荥经城乡呈现一种特殊繁荣。其原因是荥经产的烟好，早已遐迩闻名，最出名的是荥经河两岸的东区和南区的苦荞坡，西区的磨刀溪，北区的课子石等，尤以东区的“牛肉红沙口”烟最著称。双溪子的筲箕弯（今庙岗乡山河村）产的烟被誉为烟中珍品。其特点是开包口呈“牛肉红沙集鱼蛋形”，熬制熟烟过滤后泥脚子呈白色，一两生烟可熬八钱熟烟，高于其它；裹烟炮子油光泽润，可与云南丽江烟媲美。那时，新添站成为四乡鸦片烟集销场，每逢农历三、六、九赶场天热闹极了。有从雅安县观化、大河、望鱼乡来的；有从天全县铜厂、烂池二沟来的，有从峡口以外的前阳、丁村坝来的。在这些通道上，赶场的人络绎不绝。

外来商客赶烟会，都想买到真正的东区货，于是假冒“珍品”，以假乱真，实不鲜闻。假冒方式较多，常见的有

将烟苗正茎上蘖生包球摘下，熬成膏，作包装外皮，或渗入其中。当时乡长、驻军保安大队长袁伯济、警卫大部刘济民等有权势的人都在这样作弊。并借此榨取民膏。城郊李××自种和开酿酒房积烟数百两，被警卫大队长刘济民的副官刘×“猎获”，诬其熬膏子卖假烟，吊打在兰云泰后院，死去活来。李无奈，只好送交300多两烟说情，始得脱身。前聚坝肖××常到天全县的铜厂、烂池沟买回鸦片烟，经加工渗膏，包装成约10两一包的蚕形包子，转售外商获利。一次，在新添站遇外商，肖拿出一包烟，进行讨价还价。肖怕暴露渗膏，开价偏低；商客早有戒心，故意还高价，很快成交。经交手过戥后商客假意声称要开包验质，将原货还肖，即速离去。待肖发现烟包有异样，闻之有异味，开包查视乃豆渣也，急寻商客，不复得见。肖想得便利反受骗，自不敢声张隐衷；知事者则在背地里以“鬼想罗汉儿钱”作为笑料。

在种烟的年辰，民间枪支逐年增多，其来路多出军方，除了打垮保安队张禄宾部获得外，就是以烟换得的。那时，年轻人多以带枪显耀，其中亡命的，宰过一、二次埂子（即大路上抢人）就会成大哥。年轻人常以“老子请你吃花生米（指枪弹）吓唬人。过年过节时，以鸣枪代放鞭炮，且借以斗富斗势。当枪声震荡在瓦背上时，便有人称这是×少爷在房背上撒米（因消耗一颗子弹价值一升米）。每逢娶亲、送葬都以鸣枪代鞭炮，似乎一切文明礼仪都系在枪杆上。至于那些一幕幕仇杀，财杀的惨案，闻之则就使人惊心动魄了。

1991年11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